

再談朝鮮本與明清內府本

——以開本為中心

陳正宏(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上海200433)

拙作《朝鮮本與明清內府本》曾從字體、色彩兩個角度，對朝鮮本和明清內府本的關係，做過一點粗淺的探討。本文則擬再以漢籍的開本為視角，對相關問題再作分析，故以“再談”為名。

如所周知，在現存的東亞漢籍中，朝鮮本以開本闊大聞名。但是如果我們稍微細緻地考察一下朝鮮本的刊印歷史，會發現大開本的流行，是李氏朝鮮王朝世宗時代（1418-1450）開始才有的事情。在世宗以前，朝鮮王朝刊印的書，像太宗三年（1403）擺印的著名的癸未字本《宋朝表牋總類》，開本的縱橫就只有27.1×15.4釐米，至於再早的高麗時代刊本，也是中型開本為主，很少見到縱長30釐米那樣的大開本。

那麼，世宗時期何以會流行起大開本呢？解釋這一疑問，還得從世宗的登基說起。

公元1418年，也就是中國明朝永樂十六年。這一年的九月四日，明朝派遣的一位名叫陸善財的宦官，作為欽差使臣來到朝鮮。陸善財此行除了帶著永樂皇帝的敕書，幫助朝鮮國王李芳遠廢除長子李禔的王位繼承權，使三子李禔順利獲得登上國王寶座的資格，另一個被後人忽略的舉措，是他帶了一批永樂皇帝欽賜給朝鮮的一種欽定編纂新書《名稱歌曲》——全名是《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

這種《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現在在中國國內的不少圖書館都有收藏，比如上海圖書館收藏的一部，是永樂十八年的後印本（此書初刻於永樂十五年）。直觀地看，此書給人最深刻的印象，首先是它驚人的厚度，達7.2釐米。其次是闊大的開本，縱橫有33.7×26.5釐米——考慮到上海圖書館的這個藏本已經明顯被改裝過，存在裁切的可能，因此它原本的開本，縱向或許有36釐米或者更高。

從文獻記錄上看，更令人驚訝的，是這種《名稱歌曲》被陸善財帶入朝鮮的數量——

辛亥/欽差宦官陸善財奉勅書及欽賜《名稱歌曲》一千本來。（《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卷一世宗即位年九月四日辛亥條）

無論是從傳統的雕版刷印，還是近代機器印製來看，“一千本”都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因此它們抵達朝鮮後的去向也就值得關注。據《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卷二記載，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世宗有旨：

《名稱歌曲》毋令被管絃，令禮曹移文于留後司及京畿、黃海、平安道，令使臣所過州郡僧徒誦習之。

可見它們是由國王的使臣帶去了地方州郡，而主要讀者是僧侶。

無獨有偶，僅僅過了一年，公元1419年，永樂皇帝又賜書給朝鮮世宗。這回給的是一種名叫《為善陰鷲》的善書，分兩批送出，數量則更為驚人：六月六日由赴北京的朝鮮燕行使李之崇帶回了六百本，兩個月後的八月十七日再由欽差使臣、太監黃儼再帶去一千本，兩相合計高達一千六百本——

聖節使李之崇回自北京。皇帝就賜上《為善陰鷲書》六百本、上王驢騾各十頭。初，元閔生之赴京也，上王授馬六匹，要買驢騾，帝知之，故有是賜。（世宗實錄 卷4. 世宗元年六月六日己卯條）

使臣太監黃儼至 上王及上以時服 出迎于慕華樓 先導至景福宮。宮城門外 結綵棚 設雜戲 夾道結綵。使臣至 宣勅書。上王及上受勅 行禮如儀 訖 與使臣行茶禮。使臣謂上王曰“皇帝命臣曰中國非無酒果也。但道路阻遠 乃以生絹三百匹 表裏三十匹 羊一千頭 以資酒果之債。右件等物，王其輸之以王府所有，充其宴享之費。”使臣先歸太平館。命兵曹參判李明德、知申事元肅受綵帛十五匹、綵絹十五匹、生絹三百匹、羊八頭、鵝十六隻、《陰鷲書》一千本。（世宗實錄 卷5. 世宗元年八月十七日己丑條）

上述兩段引文中的“上王”，就是太宗李芳遠；“上”則是世宗李禔。《為善陰鷲書》和《陰鷲書》顯然是同一種書，其正名是《為善陰鷲》。

這部永樂十七年（1419）刊刻，當年就以如此巨大的數量輸入朝鮮的十卷本《為善陰鷲》，中國大陸現存卻很少，僅天一閣博物館和山東省圖書館有藏。天一閣本雖然有後裝的外封，但原外封尚存，開本有36.0×20.7cm。而書內版匡為26.8×17.0cm，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字十九字。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如所周知，這個明內府刻本《為善陰鷲》的字樣，就是後來朝鮮著名的初鑄甲寅字的字本之一。

中朝兩國書籍交流的歷史源遠流長，但是同一種書的中國印本，以複本超過千本這樣龐大的數量輸入朝鮮，似乎是史無前例的。我們猜想，這一定會使朝鮮的讀書人尤其是官僚貴族階層——兩班階層，對正規的書籍形制應該是怎樣的，有直觀而深刻的印象。而朝鮮王朝政府對誦習包括該兩種開本濶大的明內府刊本在內的中國本的強調，雖然用意在於書的內容，但客觀上想必一定也會加深朝野士大夫的這種對於書的開本形式的印象。當年底獲得世宗贊同的禮曹建議，即是其例——

禦經筵。禮曹啓：“頒降《諸佛如來名稱歌曲》誦習事，曾於京外寺社行移，然今或作或輟。請令京中各宗則僧錄司、外方各寺則留後司及諸道監司考察，每季月誦習日課，置籍於歲（抄）〔抄〕傳報禮曹，以憑檢舉。其《勸善書》、《陰鷲書》、《神僧傳》，悉令堅藏，如有污穢破毀者，嚴治其罪。又赴選僧徒，依儒生講《文公家禮》，能誦《名稱歌曲》者，許令赴選。”從之。（世宗實錄 卷6. 世宗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壬午條）

既然來自中國內府的大開本原書與僧人書生的進階如此密切相關，其保藏又為官方如此看重，則這樣形制的書籍是王朝最重要的書的理念，無疑很快就會深入人心。

因此，儘管都是朝鮮王朝官方製作的最高檔次的金屬活字本，早期的癸未字（太宗三年，1403）本《宋朝表牋總類》開本不過27.1×15.4釐米，正文版匡也只有22.8×14.0釐米。庚子字（世宗二年，1420）本《史記》和《文選》，版匡幾乎沒有改變，前者是22.1×14.75釐米，後者22.8×14.6cm，但開本卻突然放大到31.9×19.1釐米和30.3×16.8cm。到世宗十八年（1434）初鑄甲寅字時，所印書籍無論是開本還是版匡都全面放大，像《真西山讀書記乙集大學衍義》的版匡是26.2×16.7cm，《資治通鑒綱目》的版匡是27.7×20.0cm，開本縱向都超過了30釐米。而它們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字十八或十九字，雙魚尾，四周雙邊的形式，令人無法不與明內府本《為善陰鷲》相聯係，更不必說甲寅字原本就是以《為善陰鷲》為字本之一的了。

當然，朝鮮世宗朝前期朝鮮本開本的變大，尤其是以甲寅字本為始，形成開本與版匡兩方面同時向擴大方向發展的趨勢，另外還有一個不容忽視原因，就是同為明永樂間內府刻本的《五經大全》、《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的輸入。不過其輸入的方式，與《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和《為善陰鷲》完全不同：不是靠複本的數量，而是靠在朝鮮半島本地的大量翻刻。

永樂間內府刊印的全本完整的《五經大全》、《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和明代原裝的單本大全，今天在中國大陸都不易得見。綜合北京故宮所藏和上海等地所見，大致可以歸納出該以“大全”為名的叢書的形制面貌：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字二十二字，中字單行、小字雙行同。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版匡約26.0×17.0釐米左右，開本約34.5×21.0釐米左右——這個開本，與北京故宮所藏、仍保留著明代包背原裝的明嘉靖內府刻本《大明集禮》的開本34.5×20.7釐米是十分接近的。

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的傳入朝鮮的時間，也是在世宗元年(1419)的十二月，那是永樂皇帝作為特殊的禮物送給赴北京的世宗之弟敬寧君李祹的。但書來到朝鮮後，似乎就不是李祹獨佔的秘笈了，六年後世宗為了翻印該叢書，已經在命令地方諸道“給價換楮”，造紙進貢。

傳旨忠淸、全羅、慶尙道監司：欲印《性理大全》、五經四書，其冊紙給價換楮，忠淸道三千（貼）〔帖〕、全羅道四千帖、慶尙道六千帖，造作以進。（世宗實錄 卷30. 世宗七年十月十五日庚辰條）

雖然世宗七年翻印的大全本我尚未見過，但直到十八、十九世紀，朝鮮刻本系統中的單本大全如《中庸章句大全》等，開本、行款等跟最初傳入朝鮮的永樂內府本仍頗接近。個中消息，已經可見二者的密切關聯了。

公元1792年（當清乾隆五十七年），朝鮮正祖在召見即將燕行的冬至正使朴宗岳等時曾自豪地說：

我國書冊，紙韌而可以久閱，字大而便於常目，何必遠求薄小纖細之唐板乎？

此不過便於臥看，必取於此，而所謂臥看，亦豈尊聖言之義乎？（正祖實錄 卷36. 正祖十六年十月甲申條）

“唐板”或者叫“唐本”也就是中國本。此時的朝鮮國王所能見到的中國本，大部分應該是由朝鮮燕行使帶回或中國赴朝使節帶入的清廷賜書，其中自然以清代內府本為主，其副本與當時普通書籍已無多少差別，故被正祖鄙視為“薄小纖細”。顯然，此時朝鮮半島的這位最高統治者已經完全忘記了（當然也許是根本就不知道），朝鮮本“紙韌而可以久閱，字大而便於常目”的特徵，原本是從中國明代內府本裡學去的。東亞漢籍刊行史中這般顛覆性的場景，用一句中國俗話說，真可謂是“換了人間”；而其更廣泛意義上的影響，今天看來依然頗可玩味。

《朝鮮本與明清內府本——以印本的字體和色彩為中心》，收入拙著《東亞漢籍版本學初探》，中西書局2014年版。

《明實錄·太宗實錄》永樂十六年秋七月丙子條云：“朝鮮國王李芳遠遣使言，世子禔驕恣不肖；第三子禔孝弟力學，國人之所屬望，請立為嗣。從之，賜敕諭曰：‘立嗣以嫡長，古今常道。然國家盛衰，實系子之賢否。今欲立賢為嗣，聽王所擇。’”但未言陸善財出使事。《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卷一即位年（即永樂十六年）九月辛亥條記陸善財持永樂帝敕諭出使朝鮮事，且所記較《明實錄》更詳細，茲錄如下，以供對照：“辛亥/欽差宦官陸善財奉勅書及欽賜《名稱歌曲》一千本來，結彩棚、設儺禮，上率群臣奉上幸慕華樓以迎，至景福宮，行禮如儀。上王升殿受勅書，曰：‘王奏長子禔不德，不堪為嗣，以第三子禔性頗聰慧，孝悌力學，一國之人，悉皆屬望，可立為嗣。朕惟立嫡以長，古今不易之常道，然家國事重，嗣子之賢不肖，國之盛衰存亡係焉：果賢也，則祖宗有托，一國之人受福；苟惟不賢，則宗祀無依，而亂亡繼之，一國之人受禍。王為國家長久之慮，鑑盛衰存亡之機，欲立賢為嗣，聽王擇焉。’上王覽訖，還小次。有頃，陞殿，與使臣行禮與坐，謂曰：‘吾素有疾，請以子禔為嗣。遣元閔生聞奏後，疾轉劇，令禔攝國務。’上王還內，上陞殿，與使臣行禮。使臣歸太平館，上王還宮，上幸太平館，設下馬宴。”

按《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二一三永樂十七年六月辛巳條云：“遣中官黃儼使朝鮮國。敕前國王李芳遠曰：‘王祇事朝廷，始終不怠，比陳年老，請以子禔嗣爵。夫繼世在於有後，而傳緒在於得人。王能簡賢命德，俾宗祀有托，且副國人之望，朕用嘉悅。特遣太監黃儼齋敕勞王，王其優遊暮年，益膺壽福。’敕國王李禔曰：‘爾父以爾孝弟力學，可承宗祀，請嗣其爵位。爾常念傳序之不易，孝以事親，忠以事上，俾子孫世享其慶，而一國之人亦永有賴焉。其敬之哉！’並賜《為善陰騭書》一帙。”其中所記永樂帝賜書僅一冊，與《朝鮮王朝實錄》所記“一千本”明顯不同。但細繹《明實錄》文意，此處的“并賜《為善陰騭書》一帙”，當是指永樂帝交黃儼帶去的親自贈送給登基未久的世宗的一冊《為善陰騭》，意在勸其“孝以事親，忠以事上”。這與明朝送給朝鮮王朝的一千本禮品書意義不完全相同，所以後者的數量雖大，雙方實際處理書物的人員級別都低了不少。

山東省圖本未見實物，其名列“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中，編號1149。

所謂“字本”，即單個活字的字樣。

參見韓國千惠鳳氏《韓國典籍印刷史》第235頁圖版107、第237頁圖版108，汎友社1990年版。

永樂刊本《為善陰騭》即每半叶十行，每行大字十九字。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

《大明集禮》開本尺寸據朱家潛主編《兩朝御覽圖書》第168頁圖一百七十二著錄。

《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卷六世宗元年十二月七日丁丑條：“敬寧君祚、贊成鄭易、刑曹參判洪汝方等回自北京。皇帝就賜麒麟、獅子、福祿，隨現寺、寶塔寺祥瑞之圖五軸。福祿似驢而高大，頸長抗，白質黑文，人不能名，帝自名之曰福祿云。皇帝待祚甚厚，命禮部照依世子視朝見時例接待。一日，詔祚陞殿上，帝降御座，臨立祚所跪處，一手脫帽，一手摩髻曰：‘汝父汝兄皆王，汝居無憂之地，平居不可無所用心。業學乎？業射乎？宜自敬慎讀書。’特賜御製序新修《性理大全》、四書五經《大全》及黃金一百兩、白金五百兩、色段羅彩絹各五十匹、生絹五百匹、馬十二匹、羊五百頭以寵異之。”

有關清廷賜書朝鮮的情形，參見楊雨蕾《燕行與中朝關係》第115頁，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版。